

本已推辞清华招聘 前辈一席话黄天荫毅然踏出舒适圈

现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陈冯富珍对黄天荫说：“中国的医疗系统正在进行重大改革，我们可以亲身参与其中，或仅仅在旁观望。”这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李思邈 报道
lism@sph.com.sg

在本地乃至国际眼科领域，黄天荫教授的名字都是一块招牌。但他在年过半百时，今年却面对事业上的一大转变：他要重拾放下多年的华语，到北京清华大学开创新的研究学院。

黄天荫在清华大学的全球海选中脱颖而出，这突如其来的越洋猎聘，他原本是拒绝的。一来没有想过要在53岁开创一番新事业，二来这名英华学校校友也担心自己对中国了解不多。

“与我同代的不少新加坡人都接受英语教育，更熟悉西方文化，因此对中国的理解和分析不够深入。”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医学总监兼高级顾问、新保集团副总裁（研究与教育）及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学术与临床发展部副院长——这是黄天荫教授目前的职位全称。

起初，他推辞了清华大学的邀请，但校方请他再三考虑。双方在今年2月到6月间经过了八场相当深入的面试，探讨了黄天荫的学术科研背景，以及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培养临床科学家的发展。

与此同时，黄天荫也征询了不少前辈、上司和政府部门人员的意见。“大家对于有这个机会让一个新加坡人参与这份工作

很支持，让我们与中国医疗界能交流学习。”

随着他明年将到北京，担任清华大学一所新研究学院院长，黄天荫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回顾他的成长和事业历程，并分享他对新中两国医疗系统的见解和展望。

谈到自己为什么愿意踏出舒适圈，他提到现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告诉他的一席话：“中国的医疗系统正在进行重大改革，我们可以亲身参与其中，或仅仅在旁观望。”

这让黄天荫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我一直以来都鼓励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学者、专家和医疗人员，到国外寻求机会。大家应该勇于学习和进步，在不同环境和文化中自我挑战，从中增长见识。如果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人都可以，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呢？”

父亲生前研究中国经济 母亲曾任高级政务部长

闯荡中国，家庭因素多少也有点影响。黄天荫的父亲是已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所长黄朝翰教授，母亲是曾担任教育部和卫生部任高级政务部长的简国博士，两人年轻时从香港来新加坡任教。黄朝翰教授



黄天荫教授来年将卸下目前所有职务，到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担任新医学院的创学院院长。（海峡时报）

生前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常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

除了准备前往中国，黄天荫也在忙着本地交接工作事宜。他笑称，签证等好多事还要处理。“我还不知道自己怎么飞过去，到了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安排。”尽管如此，黄天荫对展开事

业新阶段十分期待，其中也伴随着些许感慨。

“我的父亲早在90年代初，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时就预测到中国日后的迅速发展。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在中国工作，但我觉得父亲应该很开心我有这个机会。”

黄天荫： 新中医疗环境相似之处颇多

黄天荫认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医疗大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人口老龄化以及慢性疾病的增加。“随着人们的收入提高，对健康和医疗护理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相比之下，两国医疗系统的不同体现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黄天荫指出，新加坡的人口分布较集中，加上完善的初级护理系统，得以通过诊所、家庭医学和不同公共卫生计划，确保服务均等。中国则是善用人口的优势，在大数据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人口的分散也驱使中国更快转向数码医疗模式，因此人们对科技的接受和使用普遍较高。

黄天荫期待能够进一步地了解清华的文化，以及中国的不同医疗趋势，尤其是城市和农村个别的需求。配合清华的长处和侧重点，他将和医学院的团队制定发展策略和蓝图，以扩展现有医学院的课程、与附属医院建立更强的合作关系，并结合国际最佳实践，打造一个创新的医学医疗模式。

黄天荫说：“我们希望可以培养现有的医科生为未来医疗趋势做好准备，也会探讨如何把基本科研融入医疗系统的实践当中，提升病患护理。”

清华大学本月初为黄天荫举办了线上受聘仪式，校长邱勇还颁发“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聘书给他。邱勇当时说，清华大力发展医学，是完善学科布局、提升整体学术发展水平的战略举措。在清华建校110周年、清华医学院成立20周年之际，黄天荫的加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清华医学学科发展正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到国外任职，但黄天荫还是心系新加坡，来年起将受委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促进清华大学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研究、教育、临床创新和全球卫生等方面的交流。如果疫情允许，他计划时常往返新中两地。

工作繁忙仍坚持定期看诊

黄天荫每天清晨6时就开始处理电邮，上午7时30分开始一整天的会议和工作项目。尽管身兼多职，他坚持定期给病患看诊，因为与病患面对面交流是了解医院运作的最好方法。

黄天荫晚间还会抽空撰写学术论文，每天工作至少12至14小时。但他仍然积极学习，不时上课进修，包括目前修读的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管理领导课程。

这份对学习的热爱和工作的使命感，可追溯到黄天荫的家庭背景。

“我记得父母晚餐后时常批改学生的论文。小时候我也曾跟随他们到不同工作场合，对大学教授的职责有了亲身体会。我的母亲随后从政，我也

时常和她参与各种社区活动。这些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公共服务的重要性，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选择留在公共机构。”

黄天荫是总统奖学金得主，对他影响深刻的，还有求学和职业生涯中的无数名导师，其中包括“东南亚眼科之父”林少明教授。林少明的远见让他十分敬佩。

“他的目标是让新加坡领导世界眼科发展。当时的医学系统并未接纳科研，但林少明坚信其重要性。在1997年创办新加坡眼科研究院。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强调维护病患的利益，要求手术时录像。”

黄天荫最看重医疗的数码化转型。他说，随着病历、寄送药物、网络付款和预约等各

方面的服务都逐步转向线上，各种教育和培训也须完全数码化。

他的愿景是让全国眼科中心成为一家以科技为主的医疗机构，在新加坡推进智慧发展的愿景下与世界共进。

黄天荫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是在推进创新护理模式。他举例说，全国眼科中心最常进行的手术是往眼内注射药物，去年近2万次注射中有超过九成是由护士完成的。

另外，中心也使用人工智能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检测。

“尽管如此，科技无法替代医生和病患之间的人与人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能够一同为病患提供三点：提升护理疗效、优化看病经历和降低疾病风险。”

对于我国未来的医学发展，黄天荫充满信心。

首先，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不断进化和适应未来的医疗挑战，如老龄和慢性疾病，并逐渐把大部分的护理从急症医院转移至社区，也就是业内称的“价值护理”。

“有别于最佳护理，价值护理考虑到疗效和成本，对病患和社会来说最合理的护理。我们必须加以权衡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将侧重学术医学，促进科研人员与临床专家的合作。冠疫情爆发后，我国迅速研发新冠病毒检测、疫苗和创新技术，凸显了医疗科研的重要性。

第三，黄天荫认为年轻一代的医科生和医疗人员对创造影响力有强烈的热忱，这点让他感到很高兴。